



吴阶平： “红色御医”的传奇人生

》 考虑“吃饭问题”走上从医路

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6岁时就能阅读《史记·项羽本纪》、《三国演义》等。10岁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四书》、《五经》，打下较好的古文功底，也学习数学、英语。后来，吴阶平迈过小学考入天津汇文中学。

在吴阶平的记忆里，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只是在大方向上对孩子进行引导，诸如做人、为学、处事等，却很少具体关心他们哪门功课考了多少分。在当时军阀割据、政治腐败的情况下，父亲对他们今后从业作出要求，第一不要从政，第二不要从商。他认为要学科学技术，而且必须学医，医生决不会失业，不过，要学医一定要做个好医生，一定要进协和。

1947年，吴阶平经著名泌尿科专家谢

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哈金斯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勤奋的中国学生，有时看见吴阶平干脆利落地做实验、做手术，感慨地说：“你有几只手啊！”由于手术技术不一般，吴阶平在美国留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第二年年底，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他知道自己应当回国发展祖国的泌尿外科。

》 见证周恩来总理最后的岁月

从1957年起，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再由他们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

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便对病灶认真

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5年入秋以前，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总理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 行医中南海的非常应对

在吴阶平的一个记事本上有用英文字母记录着的特殊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吴阶平说：“ckl代表周恩来，cc代表江青，k代表康生。”吴阶平明白，在10年动乱期间，他担任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确确在“走钢丝”，而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高超的医术，一头则是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审时度势的本领。

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汽车直奔钓鱼台17号楼。周恩来

走出来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1971年9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又突然接到通知，说江青中毒了。按照江青的旨意，中南海门诊部顿时把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关于江青的所有的病历都抱来让她逐条审查，吴阶平等人也被关了起来，由江青的警卫员看守着。直到晚上9点钟，有人喊道：把吴阶平带到17号楼。来到17号楼会议室，吴阶平一眼看到周

总理坐在那里踏实了许多。听了周总理的提问，吴阶平回答说，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周恩来这才知道根本没有中毒问题，就将话题一转，讲起林彪和叶群逃亡的事。这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她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话、提问，把“中毒”的事忘掉了。到晚上11点，周恩来好像随口插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吴阶平就这样被“解放”了。

》 “获奖专业户”心底最爱“伯乐奖”

1982年，一本名为《性医学》的医学专著，洛阳纸贵，倒卖入黑市价格翻了好几倍，卖一本还要搭配一本别的滞销书。该书由吴阶平主持编译，是中国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本正式专著。

吴阶平就翻译工作提出几点要求：“首先，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不适合的应该删掉。比如书中有这样的小标题：配偶、同居、性伙伴。从这个标题和书中内容来看，作者是把这三者并列提出，未加褒贬，这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现实国情都是不符的。”吴阶平严肃地指出，性教育是人人需要的。从婴儿、幼年、儿童到青春期、婚育期

甚至老年都是不可或缺的。

为引导人们科学冷静地对待“性医学”，吴阶平做了大量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吴阶平的倡议下，第一次在中国以教委体育卫生司的名义出版了《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百题问答》的小册子，针对青春期进行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许多人都把有关性医学、性教育方面的书籍送给吴阶平审阅。

几十年来，吴阶平所获的奖励不计其数，可谓“获奖专业户”。仅临床科研方面，他已7次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奖。1984年，

他获得了巴黎红宝石荣誉奖章，1987年又获巴黎红宝石最高荣誉奖。然而，当原北京医科大学向他颁发首届“伯乐奖”时，他说：“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止一种，但我最看重的是这‘伯乐奖’。”

吴阶平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泌尿外科，培养了中国好几代泌尿外科医生。他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断开拓的探索者，也是广栽桃李、识拔英才的医学“伯乐”。他的学生郭应禄曾说：“现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骨干力量，几乎都是吴老师培养出来的。”

据《天津日报》



2011年3月2日21时18分，著名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和中国性教育的开创者吴阶平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这位曾经见证共和国总理最后岁月的“红色御医”，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上退下来后，本应安享晚年，但因不少社会活动来找他，使他常常不得清闲。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学术带头人，自己也是一个病人。早在1939年，他就摘除了左肾，只靠右肾支撑，尽他的医生职责。生前，吴阶平曾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找我看病的人还是很多，治病毕竟是我的职业。”可以说，吴阶平所有的“传奇”都被医生这一职业所涵盖。

